郑州文明 市博精华

宣德款龙耳狮钮铜薰炉

（明代）

李文

于尉氏河东公社周村采集，为国家三级文物。

此炉高41.7厘米，由盖、身两部分组成。盖部镂空隆起，由云带纹交错相织构成，其上蹲踞一只巨狮作钮，狮子足下踏灵芝类祥瑞之物；巨狮昂首长啸，其身腹内空，为自然排烟之道。炉身仿周代铜鼎形，平口，尖唇，折沿，束颈，两耳甚巨，由两条蜿蜒起伏之三爪龙自然形成，巨龙身躯肥硕，独角叱咤，怒目巡视；炉腹较浅且鼓侈。炉盖及腹部上下均饰四只幼狮，其间以古币纹相隔，幼狮忘情戏耍，翻腾滚爬，情趣可爱。香炉圜底，下承三只粗壮蹄足，蹄足五爪，锋利异常；足腹相接处为三只巨型独角兽，阔口龇牙，埋首专注，似正吞噬足身。炉底外侧有方形框，内饰阳文楷书，款识为“大明宣德□□监督工部官正吴邦佐造”，字体笔画正规、工整清秀。该香炉纹样考究，狮、龙刻画细腻传神，铸造精湛，腹内有多年香烬浸渍烧烤形成的烟炱痕。

吴邦佐：宣德时铸铜工艺名匠。他既是冶炼、铸造宣德炉的督造官，也是炉式、款式、色种的设计者，为宫廷的宗庙社堂，铸造了大批铜器，同时还“私铸”铜炉出售，多为精妙之器，十分珍贵，贵族豪门争相竞购。

郑邑旧址

水磨村农协旧址

朱永忠 吴瑞民

位于郑州市西南、二七区马寨镇水磨村东沟北家庙。水磨村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下郑州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所在地，至今仍保留有水磨农民协会旧址。

旧址原为村中大户张氏祠堂，原有建筑今已无存，现有建筑为2002年重建之两进四合院仿古建筑，红墙碧瓦，由大门、照壁、祭堂、东西厢房组成，占地680平方米。大门朝南，门前有高半米石狮子一对，系新镌刻品。门侧壁上书“水磨农民协会遗址”隶书字样，门楣上挂匾，上书“张氏祠堂”楷书描金字，照壁上刻有水磨农民协会遗址介绍，壁侧有郑州市第十八中学所立“李大钊题词纪念碑”一方。另院内有清代石碑一通嵌于祠堂右壁，为清乾隆二十年（1755）张氏始建宗祠时所立，上书建祠原由及张氏宗承。门侧有古柏一棵，高50余米，为建祠时所植，保护完好。

据《二七区志》记载：1925年春，根据中共“四大”会议精神，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郑州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水磨村是大革命时期郑荥密地区农民运动的中心地区。1925年，李大钊来此考察农民运动，并发表了《土地与革命》一文。是年5月，共产党员肖人鹄、戴培元和共青团员刘墨晶到水磨村，与村长张培泽一起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以张氏祠堂为活动场所，办起农民补习班，进行国民革命教育，针锋相对地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开展斗争，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

1928年，根据当时河南省委指示，该农民协会组织了著名的杨寨暴动，革命的火种迅速撒遍周边地区，为后来的大规模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水磨村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发祥地之一，1925年成立的农民协会已光荣地载入史册。2002年，马寨镇在郑州市二七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多方筹资对“水磨农民协会遗址”进行修复，并以此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郑州广大团员青年及中小学生中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随笔

牵挂的分量

陈鲁民

人这一生，会牵挂很多人，也会被很多人牵挂。有了牵挂，人就有了精神寄托，同时也有了精神负担。有的牵挂会使人心变得柔软，有的牵挂会使人格变得高贵。

牵挂朋友。朋友是人生的财富。但说老实话，朋友能交到刘、关、张份上的不多，管鲍之交更是凤毛麟角，常人对朋友的牵挂，既有情谊的成分，也有功利的成分。所以，我们常常是有事的时候才会想起朋友，山穷水尽想找人帮忙了，喝酒打牌想找几个人聚聚，自驾游想找个伴一起出行，或者周转不灵银根吃紧了，这会儿就特牵挂朋友。

牵挂情人。对情人的牵挂，特别炽热，甚至是狂热，这多半要归功于荷尔蒙。那种牵挂，朝思暮想，望眼欲穿，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但牵挂时间一般不会那么持久，更不可能“海枯石烂”。一旦情人发展成了寻常夫妻，那就改牵挂柴米油盐、房子、车子了。或者情人劳燕分飞，各结新欢，慢慢就互相淡忘了。多少年后，或许还会偶然想起，那也谈不上牵挂了。

牵挂师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显然有些夸张，很多教过我们的老师，因为印象不深，没有过多交往，毕业后就很难再想起。但对那些我们敬重且有恩于自己的师长，还是会经常牵挂的，逢年过节，老师诞辰，就会想起老师的教诲，想起老师的音容笑貌，想起校园的美好时光，于是就会遥致问候，寄去礼物，或在心里默默祝福恩师健康长寿。

牵挂父母。年少时，我们还不懂得什么叫牵挂，只会胡吃海喝，给父母添乱、惹祸；年轻时，我们忙于恋爱、结婚，只惦记着父母的钱包，要他们帮着买房、买车；人到中年，等我们真正懂得牵挂父母时，他们大都已进入晚年，或体弱多病，或难以自理。可是，事业和家庭又不允许我们与父母朝夕相处，连“常回家看看”都是奢望，远在千万里之外的儿女，怕他们生病、孤独，怕他们生活不便、发生意外，这种牵挂也是柔肠寸断，日夜萦怀。

牵挂儿女。是所有牵挂里分量最重、时间最长的。我们自己当了父母后，才能体会到这一点。父母对子女的牵挂，是没有时间期限的，也是无私且没任何功利目的的。我的母亲已80多岁了，不仅每每对我问寒问暖，还对我的事业格外牵挂。我时有文章见报，母亲就专门订了我常发文章的几份报纸，一发现有我的文章就保存起来，等见到我时交给我，甚至我用笔名的文章，母亲也能发现。

我自己也是如此，女儿在北京上学时，我天天惦记北京天气；女儿到美国留学时，我关心美国天气；女儿回国后在上海工作，我又关心上海天气，常给她打电话，叮嘱添衣服、打雨伞，她每次都说我是“瞎操心”。瞎操心也得操心，谁叫我是她的父亲呢。女儿炒股票，我担心她没时间盯盘，本来对股票没兴趣的我，也学会了看股票大盘，对女儿买的那几只股票全方位跟踪，给她通报信息，出谋划策。她赚了钱，我比她还高兴，她被套牢了，我也郁郁不乐。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牵挂，是一种高尚而沉重的情怀，历代多有美谈。曹操牵挂才女蔡文姬，重金将她从匈奴赎回；刘备牵挂新野父老，不惜携民过江；李密牵挂老祖母，辞官在家奉养；杜甫挂念朋友李白，“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东坡牵挂兄弟子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林觉民牵挂妻子，《与妻书》满纸缱绻，一往情深；李叔同牵挂学生刘质平留学学费不足，宁愿为其推迟出家……

牵挂是人与人之间珍贵的情感，牵挂人和被人牵挂都是一种幸福。

水乡纪实（油画） 金瑜

小说

足迹

孙道荣

没事的时候，周老伯喜欢一个人在家里看看照片。他家客厅的三面墙上，全部挂满了照片。这些照片，是儿子带他出去旅游时拍的。每一张照片，都能勾起他的一段美好回忆。

周老伯已经93岁了，在村里，他是唯一出过国的老人，他的足迹，哦，不，准确地说，他和儿子一起的足迹，差不多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像大多数农村老人一样，周老伯一直没怎么出过远门。年轻时，外出打工，讨生活，做泥水工，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百公里外邻省的一个县城。此外，他的大半辈子，就是围着那几亩田转。

有一年春天，最小的儿子忽然问他，想不想到北京去看看天安门？怎么不想？在孙子的课本上看到过，好气派，好向往。可是，恐怕也只能想想了，这辈子怕是去不了了。那一年，周老伯已经77岁，如果不是儿子问起，说实话，以他这个年龄，去北京，看天安门，这个念头，他想都不敢想。

儿子真的带他去了北京，看到了天安门，爬上了长城，瞻仰了毛主席。那是他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地方，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坐地铁，也是他第一次出去旅游，第一次拍了那么多风景旅游照。

回来后，他把儿子拍的照片，都挂在了墙上的相框里。整个相框都贴满了。乡邻们看着相框里的照片和风景，羡慕得不得了。这张照片是哪里，那张照片是怎么拍的，周老伯乐此不疲地一遍遍向客人介绍着，那是很多乡邻一辈子也去不了的地方。

从那年开始，儿子每年都会带周老伯出去旅游一趟，16年了，从未中断。这是最近几年父子俩的足迹：2010年，走出国门去了新马泰；2011年，到了宝岛台湾；2012年，来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今年，父子俩又去了周老伯神往已久的古城西安。和以往一样，每到一个地方，儿子都会给他拍照片留念，也会请其他游客，帮他们父子俩合影。他们的足迹，已经挂满了客厅的三面墙。

进入老年之后，还能去这么远的地方，看这么多风景，周老伯很开心。这全是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儿子。

周老伯虽然身体还硬朗，但终归年龄大了。90多岁，别说旅游，很多人门都不敢出了。坚持带老父亲出去旅游，这是要付出很多艰辛，冒着很大风险的。这些年，为了让周老伯安全、舒适地旅游，儿子想了很多办法。周老伯年纪大了，胃口不好，旅行团队餐吃不了，每次出去旅游前，儿子都会准备好米、土鸡蛋和老爷子喜欢吃的榨菜，甚至连电饭锅都带上，在旅途中给老父亲开开小灶；每到一个地方，儿子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问好附近的医院，以防老爷子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可以随时就医；为了路途之上老爷子轻松些，儿子还自己动手，特制了一辆折叠的轮椅车，平时老爷子坐坐，歇歇脚，收叠起来，就是一个拉杆箱。

旅行是快乐的，也是短暂的，但快乐是可以延续的。每次旅行回来之后，周老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将照片挂上墙，然后，没事的时候，每天看几眼，那是儿子陪他去过的又一个地方呢，他的眼神中是无限的满足。

我也经常看到这样的一幕：昏暗的灯光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戴着老花眼镜，在翻看影集。照片已经泛黄了，是老人年轻的时候，带自己的孩子游玩时拍的。照片中的孩子，是多么快乐，照片中的年轻父母，是多么满足。那也是足迹，那是父母陪孩子成长的足迹。但是，一眨眼，孩子长大成人了，离开了父母的身边，足迹似乎就此断缺了。

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父母陪我们一起成长，留下了一行行清晰的足迹；当父母年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陪陪父母，带他们出去走走，再一次留下我们共同的足迹呢？

老照片

王少红

一幅又一幅
一张又一张
我们拥有着记忆中最珍贵的收藏
不要说
黑白灰的底色
单调了镜头对色彩的渴望
不要说只知道迷惘
那时候我们年轻
有饱满的热情和美好的理想
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
看一看
仔细地看一看
是不是
即使没有斑斓的色彩
但我们有展翅欲飞的翅膀
再仔细瞧一瞧
是不是
我们的一双双明眸
目标一致地注视着前方
如今皱纹改变了我们的模样
老照片已然泛黄
青春谱写的友谊
却同时间一起一天天绵长
当年的小伙和姑娘
脸上多了岁月的沧桑
回眸旧时光
老照片里的小伙伴呀
我与你们长相忆不相忘

新书架

《我的童年在台湾》

刘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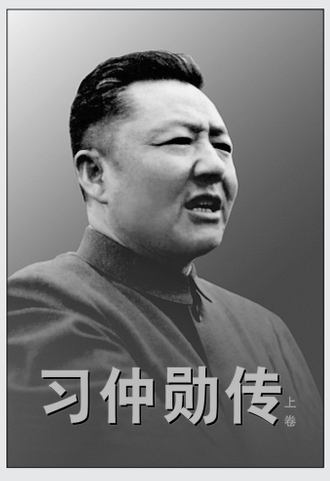
年少时，我们向往外面世界的新奇事物，向往一种“不同”于自己的生活。我们义无返顾地走出去，不愿回头。游走四方，韶华不再，心中的某个角落却隐隐不安，常想回头望，却没有一条路通向心灵的故乡。

这本书，不仅记录了台湾的青春印记，也收录了黄宝莲的半生智慧。一个温润率性又可爱的女子，游历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其眼界之宽广、思维之灵动、感悟之深刻，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每一篇文字，你都可以见到一个女子的喜和悲、充实与孤独。矛盾的情感如此真实，触动到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永远走不出，再也回不去；那里，就是我的故乡；那里，有我们的青春。

春归风静联（书法） 崔向前

连载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和福建省负责人马兴元、郭超等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负责港澳工作的人员参加。这次会议检查总结了中发[1979]50号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

习仲勋和刘田夫向会议汇报了广东的情况：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筹建工作的步伐明显加快，一支精干的专家队伍已参与到深圳、珠海特区的建设规划中来；起草拟订出包括外资企业的注册、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特殊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管理等内容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草案）》；一批开拓者已进入特区工作，蛇口工业区开始建设。1979年广东省外贸出口创汇创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增长32%；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达到20.5亿美元，增长32%；与外商签订装配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的合同金额达6.56亿美元。在汇报成绩的同时，也汇报了存在的问题：随着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加，又出现了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等问题；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实践和经验，加上缺乏必要的防范措施，出现了走私和黑市买卖港币等问题；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由于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对中发[1979]50号文件的某些规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在工作上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汇报中特别谈到，社会上对特区这样的新生事物有很多议论，有人甚至怀疑广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随之，福建省也做了汇报。

这次会议，充分肯定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贯彻对外开放方针和试办特区等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研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在许多问题上取得共识。会议强调，试办特区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根据目前两省财力物力的可能，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办好，其次是珠海。会议还明确指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

3月30日，会议在广泛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重新核定广东每年财政上交10亿元，比中发[1979]50号文件确定的数额少2亿元，并就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和资金信贷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办法。此外，会议还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正式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个《纪要》并作出批示（即中发[1980]41号文件），肯定了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试验，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的时间内，两省工作有很大进展，成绩是显著的。同时在批示中，客观地指出两省在实行新体制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这是前进中的矛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广东、福建两省必须加强领导，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加快经济的发展，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中央有关各部门，要把搞好两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对两省工作的指导，采取积极的帮助的态度，而不能撒手不管。希望中央各有关部门和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6月19日，中共广东省委举行省、市直属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报告会，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纪要》的批示。习仲勋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继续解放思想，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充分发挥广东省的优势，积极稳步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切实把经济搞活，闯出一条加快四化建设的路子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此之前，中共广东省委于5月4日任命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党组书记。6月12日，又任命吴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同时，习仲勋和省委还决定，派出领导干部到香港和一些发达国家考察，增加他们对现代化建设的感性认识，增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改革开放意识。

7月29日至8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讨论运用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加快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步伐的问题。习仲勋在总结会议时指出：“中央批准我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了我们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权力，这也是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有利条件”，“现在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勇于实践，积极地通过实践、通过试验，去探索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子，使我们的经济真正活起来，加快前进的步伐。”

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于1979年12月27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经济特区”这一名称也首次见诸于新闻媒体。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与此同时，有关方面还具体制定了海关法、投资法、土地管理法和治安保护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规。经济特区对投资外商在经营管理、税收、土地使用、产品销售和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优惠的待遇，并成立了经济法庭、法律顾问处和经济仲裁办事处，使特区的立法和司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此时，外商在深圳的投资骤然增加，兴办的项目达到300多个。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习仲勋带领广东人民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终于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经济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使广东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32